

# 新旗

半月刊

第三期 實售國幣三百元

## 有密約應該公開出來

最近，我們的政府做了兩件令人不解的事：一，重新奉送內河航行權；二，重請洋大人回來主持海關。抗戰八年，差可作為代價的是『不平等條約的取消』；但現在拿回來又送出去，我們真不知道這八年的流血究竟是所為何來？

許多人痛心得很。難怪呀！因為我們是真心相信政府已經取消了不平等條約的。

可是看情形，事實並不如此。否則，為什麼要把名義上業已收回的權利，又拱手送給人家呢？

說政府諸公不懂得這些主權的重要，那是笑話。凡屬可能，政府是要不顧一切來加以接收的。君不見，炮火連天，血流成渠，不都是爲了『接收主權』？

那末，爲什麼獨對於內河航行與海關主權，如此慷慨地贈送呢？這中間是必有緣故的。據我們想，不外乎兩種情形：（一）取消不平等條約時候原附有這樣的『了解』；（二）爲要獲得更多的外援來進行內戰，最近才把這收回的主權又送出去。

究竟是什麼回事？我們一定要逼政府把秘密公開出來！

### 騙誰？

仁

日本投降，到現在十個月了。自從日皇下令停戰之後，在中國的日軍始終沒有一點反抗表示。他們乖乖地放下了武器，鑽進了集中營，除非我們『勝利國』的受降者命令他們保留武器，替我們來安內清鄉。現在，便是這樣的武裝日軍，據說也祇留

着幾千人了。

但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即在日軍放下武器的十個整月以後，我們的『盟邦』大總統杜魯門先生向國會說道：『美國將繼續以租借物資供給中國，直至日軍全部自華撤退爲止。』

彷彿中國不繼續向美國租借大量飛機、大炮、機關、彈藥，便不能將留在集中營的徒手日軍撤回本國去的！

僞善也得有個限度呀，雖然在那些最高等的洋人眼來，中國的老百姓全是傻瓜。

### 第三輯目錄

有密約應該公開出來

騙誰？

休戰期滿後

論生活費指數

爲工人伸冤

從荷印華僑被屠殺說起

天主教與世界政治

『腐蝕』（書評）

人類的災難

革命問題漫談（續）

上海絲織廠五十三天罷工（工廠通信）李阿德

智識份子與工人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Isaacs

穆德

考茨基

木君

蘭因

鳳岡

鎮遠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舒嚴

## 休戰期滿後

舒 嚴

六月六日，國共雙方分別發了命令，限定從七日中午起十五天內在東北停止戰爭。二十一日又發了命令，將停戰期限延長八天。本刊出版時，這八天期限也已過去了。根據這二十三天的經驗，大家都明白這樣談判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民衆現在應當認真考慮這個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內戰問題。應當回頭看看過去內戰底歷史。

國共之間的內戰已經將近二十年的歷史了。一開始民衆就十分痛心，希望不要打下去，希望以政治方法解決兩黨之間的糾紛。西安事變後，兩黨停戰了，民衆鬆了一口氣，很天真地認爲從此在一致對外之下中國不會有內戰了。可是，就在抗戰中，兩黨並沒有停止戰爭，皖南事變是舉世皆知的，各地大的和小的衝突更多得不可勝數。民衆更加痛心，希望抗戰勝利之後內戰也可跟着停止。抗戰終於勝利了，民衆又鬆了一口氣。可是兩黨打得更加厲害，不僅比抗戰期間厲害，而且比西安事變以前更厲害，因爲西安事變以前還沒有那麼多的飛機，大炮，坦克，美國配備或日本軍火助戰。民衆沒有辦法，祇好希望外國有甚麼公正而有力仲裁者來調停，正如受冤屈時候希望觀世音出現來救苦救難一般。果然，五星上將馬歇爾代表美國總統杜魯門，來做仲裁者。經過他的努力，兩黨的確停了戰，開了政治協商會議，議決了許許多多事情。民衆更加鬆了一口氣。將近二十年的內戰，此次該會真正停止了罷？但是協商會議議決案始終成了廢紙，停戰命令也沒有更多的人去理會。

現在新的停戰命令發了，新的談判進行了，民衆仍舊能興奮一下。但是新的失望之後，應當怎樣

呢？難道不可以從此豁然大悟麼？

我們應當覺悟，中國的內戰是不可依靠外國仲裁者來調停的，尤其不可將最高仲裁權送給外國元首底特使，因爲即使社會上有排難解紛的俠客，國際間卻沒有一個不爲自己打算的國家。

我們應當覺悟，國共內戰有更深刻的歷史原因，既不因共同抵抗外敵而停止，也不因外敵消滅而放鬆。這個內戰乃是中國社會矛盾發展到不可和解程度之表現，乃是資產階級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鬥爭，此外又反映了世界兩大國家間的衝突。

我們應當覺悟，非有第三種力量起來干涉，中國社會矛盾是永不能解決的，這第三種力量不是那在鬥爭雙方之間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也不是甚麼『民族的』資產階級，而是城市工人階級。

我們應當覺悟，祇有民衆自己才能強迫兩黨停止戰爭，才能以政治的手段，即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代替純戰爭的手段，去決定中國之命運，而民衆之中居領導地位的首先是城市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決定了中國命運，同時也可以相當地決定美蘇之間的衝突或戰爭，因之相當地決定全世界人類底命運。

## 論生活費指數

舒 嚴

據六月十二日上海申報說，外間傳說，從六月份起，上海市政府不公開發表工人職員生活費指數了，但市政府負責人否認這個傳說，自稱：『並無所知，亦未接到任何命令。』

凡讀報的人都有一種經驗，即每遇官廳否認甚麼突如其來的消息時，這消息往往是可以證實的。生活費指數問題，現在對於工人階級是太重要了，我們不能不注意牠；既然有了不發表的傳說，我們

就應當覺悟，官廳愈否認，我們愈應當覺悟。

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這一點，乃是戰後上海工人們鬥爭所得的勝利品。工人東廠腰帶，含恥忍辱，過了八年，才能爲自己利益提出要求；又需經過艱苦的鬥爭，挨打，坐牢，受人明殺和暗殺，才能獲得所要求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我們應當好好保衛這個勝利品。

這個勝利品表示甚麼呢？表示工人要求過優裕生活麼？不是！工人要求的，僅僅是恢復他們在戰爭爆發前一年的生活水準。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這句話充其量不過是恢復戰前生活水準之意，不會比這更多一分了。可是，事實上，按照市政府製造的和公佈的生活費指數來計算工資，工人果真能够恢復戰前生活水準麼？問題就在這裏。

憑直覺，憑切身經驗，工人知道即使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現在的生活也遠不如戰前。戰前，一個普通工人每月掙十八元已可勉強過活，因爲這個工資買了兩石米之後還有餘錢剩下來。現在，照上月以四倍計算，則十八元底薪可以支領七萬二千元，但七萬二千元生活并不如以前的十八元，因爲七萬二千元祇能買一石半米。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因爲生活費指數本身有了問題。最近同情工人的報紙雜誌，如『文匯報』，如『生活知識』，常常有人寫文章指出市政府公佈的指數是不真實，是難以叫人相信的。當然囉！數目字，算學，統計學，這類學問，雖然有人否認牠含有階級性，但市政府拿來計算生活費指數，而此指數或高或低又有影響於資本家錢袋時候，我們是很難保證官廳會『爲科學而科學』純然客觀地編製統計表的。『文匯報』記者，用同一算學和統計學，計算同一城市，

同一月份，同一生活費指數，算出來的卻與市政府公佈的不同。據說，五月份上海工人生活費指數應當是七千六百四十九倍，而不是四千零九十幾倍。

工人沒有學過高等算學，不懂得統計學，不能在科學立場上判斷市政府底指數和文匯報底指數那個更合於此理些。但憑直覺，憑切身經驗，工人可以斷定文匯報指數是比市政府指數更加接近於真理的。

正爲官定的生活費指數距離真理太遠，所以某部分工人才又提出增加底薪的要求，以此惹得資本家氣憤，說：『既要求依照生活費指數，又要求增加底薪，自相矛盾，豈有此理！』你看資本家多麼理直氣壯！

但現在，不僅增加底薪受拒絕，連依照生活費指數，人家也要不允許了。人家乾脆不編製，或公開發表，甚麼鳥生活費指數！

工人必須爲保衛這個辛辛苦苦得來的勝利品而鬥爭，不僅要求繼續依照生活費指數計算工資；而且要求工人自己編製指數，由全市真正的羣衆工會共同推舉一個委員會來編製指數，此委員會必要時得聘請專家做顧問。市政府是否繼續編製和公佈生活費指數，隨他的便，但計算工資時必須依照工人自己編製的指數爲標準的。

## 爲工人伸冤

鎮遠

上海的工人階級，剛剛抬起頭來，現在又遭到災難了！

八個多月來的鬥爭，表示出上海工人新的力量，他們爭得了好多經濟上的改善，他們組織了好多自己的工會，以後並且還要從經濟要求進而參加民主運動，以恢復他們從前英勇搏鬥的傳統力量。不

幸得很，工人剛纔醒覺起來，使資本家及其僕從們大大驚慌了。他們利用自己的報紙和雜誌，製造一些歪曲的輿論，來圍攻工人，使工人失掉社會的同情。他們說：『工人企圖過優裕的生活』；彷彿只准工人餓着肚皮，做牛做馬，來替資本家爭取足夠的利潤。

最近更變本加厲了。上海新市長走馬上任後幾天，就直接下來一個消弭工潮的措施。五月廿九日，他召集全上海二百五十餘產業和職業工會理事，約一千四百餘人訓話，宣佈工人的罷工和怠工是非法，說工人要求生活改善，是不安分，不知足，要『取締』，『制裁』，『拒絕』。並且還規定辦法五條：『一，絕對不許罷工，怠工，要強迫仲裁』；『二，鼓動罷工者，一定與米商同樣嚴辦』；『三，如萬一罷工，罷工時期內，工資不發，福利金亦不承認』；『四，鼓動罷工，怠工，於增加工資後，如發覺有向勞工強索抽成者，可檢舉重辦』；『五，要勞工嚴守紀律』。拿這五項辦法來對待工人，無異把工人束縛起來叫資本家任意剝削。這顯然是太不公平了。

頂頂說不過去的，莫如把工業的危機。也加罪於工人頭上。他們說：『工潮不能迅速消弭，不懂爲上海工業界之嚴重危機，且將促進上海經濟整個崩潰，戰前我國一般工資較各國爲低，現在工資標準已超過世界任何國家。如紡織工人工資，則較美國高昂倍罷，長此以往，五六個月之後，工廠已全部停閉，大量工人失業，上海經濟基礎勢將整個崩潰，彼時社會治安，更將無法維持，其嚴重性質較任何問題爲甚』。這種意見，不僅資本家的幫手們是這樣說，就是自命爲『民主』奮鬥的人，亦大同小異的這樣說。這種滿紙虛構曲解，真令人奇怪。其實目前工業危機的主要原因是：（一）美國

貨的大量進口，同類的工廠，都受到不能抵抗之苦；（二）官僚資本的操縱壟斷，借外債，化外匯，人民負擔加重；（三）工廠貸款的利息高昂，工廠的負擔加重；（四）交通阻梗，水脚昂貴等壓迫所致。我們且看萬家織造廠的經理蔡若民在六月一日工業界代表會上質問當局的話，是最好的證據，他說：『……其實即使工人不拿工資，不吃飯，中國的工廠亦是要關門的……』。由此可知目前工業的危機，決非工人要求生活改善的緣故，而是當局一意孤行，借外債，高利貸款，相信外國人，崇拜洋貨的緣故。

至於拿國內人工費於美國人工的話來抵制工人的要求，也是沒有理由的。工資的高低，不能籠統以工資作比較的，主要的要拿美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高漲的程度來看。美國的通貨膨脹超過戰前不過百分之三十，而中國的通貨膨脹則超過戰前五十倍，中國法幣既不值錢，工資的數目自然會比美國工人多。但物質的享受是怎樣呢？美國工人有的有汽車坐，有的有洋房住，一切飲食滋養都比中國工人好過多少倍。目前中國一般職工的生活，在物價狂漲，通貨膨脹的情形下，還是過着一種被壓迫的極窮苦生活，工人爲着保衛自己飯碗，爲着養育他們一家老少，他們已經是在饑餓線上掙扎了。現在把這樣的責任都推到工人頭上，這不但是歪曲事實，而且是昧了良心的說法呀！

當一般民衆要求民主和當權政黨宣告『還政於民』預許『實現民主政治』的時候，還要剝奪罷工權利，這未免有點過於殘酷了。如果要想『還政於民』，『實現民主政治』，首先必須承認工人有罷工權利。同時一切高唱民主的人，亦必須站在工人一起，爲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絕對自由而鬥爭。

## 從荷印華僑被屠殺說起

鳳岡

據報載：爪哇坦其隆區，最近有數百，或者數千華僑，被印度尼西亞的獨立軍所屠殺。這情形在初看之下，是很難叫人相信的。因為華僑，由於自己的地位使然，更由於中國的地位使然，照理說，是應該同情於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鬥爭的。印度尼西亞人呢，爲了自己的獨立，正在和舊統治者荷蘭，以及荷蘭的幫兇英國，作流血的戰爭，那末照理說，他們也應該同情於反對帝國主義的華僑的。

怎麼會發生屠殺呢？

報道很簡單，我們還不能斷定事實確係如此。很可能這是一個陰謀。坦其隆區處在印度尼西亞人與英荷聯軍接觸地帶，究竟是誰殺人，局外人難於判定。也許是荷英軍自己殺了人，把責任推在印尼獨立軍頭上，這樣可以挑起華僑與印尼人之間的惡感，同時却以『解救者』資格進攻印尼軍。這樣的把戲原是帝國主義者的拿手。最近這次的屠殺華僑，或許正是這套把戲。

不過，這數百或數千不幸的華僑，也可能確實被印尼軍殺死的。因為根據好幾個理由推究起來，這種屠殺確有發生的可能。現在我們就根據華僑被印尼人所殺這個假定事實來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聽見了自己的同國人在海外被人屠殺，自然該有一點同情與憤慨；但光是這點感情是不夠的，甚至不好的，因為我們這點正當的感情，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們利用了去。所以跟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我們在這裏最重要的也是試行理解。

華僑被殺，在一般人心，尤其在華僑心中，引起的第一個感想是：祖國還是不爭氣，不能保護自己的僑民。抗戰勝利了，繼續打內戰，以致強國做不成，海外的華僑仍舊受人家欺侮，殺戮。

這個感想與抱怨，自然有理由。數十年來，華僑對中國的復興抱着如此強烈的希望，對祖國的革命與抗戰，出了這麼大的助力，可是到頭來，一場勝利的空歡喜。事實上國內情形兇愈下，越發的不成樣子。國外華僑的地位照舊低落，拾不起頭來，受人家奚落。華僑把滿腔的抑鬱發向國內的當政者，自然是千該萬該的。

不過，華僑做不成『強國民』這個可悲的事實，絕對不能用以解釋此次爪哇的屠殺。印尼人比起中國人來，那更加是弱了。印尼人目前正在反對強國，用武力和強國民相搏鬥，那末他們怎麼會因爲華僑之未曾成爲『強國民』而加以殺戮呢？這顯然是別有理由的。

自從中國民衆在一九二五年開始進行革命的反帝鬥爭以來，亞洲一切弱小民族，沒有例外地，對中國以及中國人保持着好感。他們視中國爲亞洲被壓迫民族的領袖。尤其在這次抗戰之初，亞洲諸弱小民族無一不站在中國方面，公開發對日本帝國主義。可是中國抗戰領導者的國際政策，以及由此政策發生出來的各種結果，却激起了東南亞諸弱小民族很大的反感。原來中國不是憑自己的力量來反對日本，而是依賴着英美，馴至將自己的抗戰束縛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戰車之上，起一個被動的幫手作用。抗戰後期，中國的抗戰不再是，事實上也不能，爲了本身的獨立與解放，而主要地是爲幫助英美，以及他們的盟國法荷，在

## 評書

## 『腐蝕』

茅盾著，上海知識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一年十月初版，一九四六年三月四版。

『腐蝕』是一本好書。一種好的藝術品，又是一個有力的控訴狀。許多人不歡喜這種體裁，有些人嫌牠太缺少結構，但是在我看，這都沒有關係。好的作品不見得有什麼定規的體裁；而所謂結構的緊鬆，也不是裁判一個作品好壞的唯一標準。又有些人嫌故事太沈悶，太陰暗，看了叫人喪氣，叫人發生鉛樣沉重的感覺。這倒是真的。但這不是作者的毛病，更不是作者的過錯。如果牠的確給了讀者們以一個這樣的感覺，那末我想，這反而是作者的成功。是他的功績。

因爲我們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就是這樣沉重陰暗，這樣令人喪氣，這樣無法不叫人陷入鉛樣沉重的心境中的。我們的作者使你認識了這個時代與環境，至少使你看到了牠最不堪，最腐敗與最陰暗的一面。這難道不算是成功的作品嗎？

茅盾先生的這一作品，和他其他的作品一樣，都不是無所爲的。這兒主要的意義是『反特務』。反特務原不能算是什麼特色，因爲最近幾年來在歐美頗爲流行的反法西斯文學，差不多十九是以科學化的警察制度，即特務制度的暴露與描寫爲內容的。所以就主題說，『腐蝕』不過是反法西斯文學中多了一個作品，但就其處理題材的方面與描寫的手法說，却是有的特色的。

『腐蝕』不像小說，因爲牠沒有什麼情節，沒有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零碎的日記。日記裏所記的主要是主人公的內心的變遷。這一點頗使好些愛

亞洲恢復其失去的主權了。而這個主權的恢復，恰恰是對東南亞諸弱小民族的奴役的恢復。

東南亞的諸弱小民族固然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但是他們也決不願見這些英美法荷的老主人回來。他們恨這些『民主』的統治者，也許更甚於恨野蠻的日本軍閥。日本軍人倒了，他們要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他們要獨立。而這些『民主』的老主人便用飛機大炮來對付他們，叫他們仍舊做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隸。於是東南亞的弱小民族怒吼了！

在這個衝突中，我們中國的執政派却是站在壓迫者方面的！對印度，我們的國家元首曾經親自飛去，勸告印度領袖們在戰時不要反對英國。在馬來，我們在那面領導的政派（連馬來共產黨在內）都不主張推翻英國的統治。在安南，我們將『主權』移交給坐英國兵艦回來的法國帝國主義者。在荷印，據合衆社六月八日的巴達維亞電報：『在荷軍中服役的有七千華籍軍士』。

中國以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前置資格，却處處勸各被壓迫民族長留在民主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之下，這如何能叫他們對中國人保持好感呢？在這些被壓迫民族看來，中國是他們的敵人的幫兇，而事實上，有時也竟是如此的。坦其隆慘案若是印人幹的，一定是爲了這個原故。

果真如此，那麼我們應該怪誰呀！應該怪政府的依賴英美的政策。

華僑在南洋是如此之多，華僑與土著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的重要，我們如果想避免坦其隆慘案的重演，則中國必須立即放棄依存英美的政策，立即宣佈對這些被壓迫民族的同情，並立即採取有效方法來援助他們的鬥爭。否則，類似的屠殺還會層出不窮的。

此外，我們要從華僑本身來看這個問題。華僑是一個渾統的名稱，其中包含着少數的大資本案，與大多數的華工與小商人。這些大資本案雖然不是政治上的統治者，但在好些地方，占着經濟優勢，并且因此優勢，他們與白種人的統治者相結託着。極大多數的土著勞動者，倒是在這班財主的僱傭與剝削之下的。就這樣地，土著人對華僑資本家發生了仇恨。再由於土著人的政治覺醒上的落後，白種帝國主義者的有計劃的挑撥，以及土著上層分子之利用，這些土著人便把仇恨不加分別地對整個華僑發洩了。

這時候，華僑往往是『一致團結』起來，與土著人作對。但是這樣的團結是最壞的。牠首先幫助了白種帝國主義者的統治，其次幫助了華人與土著人的資本家，最後則妨礙着土著民衆聯合勞苦華僑爭取獨立與解放的大事業。所以，在南洋區域的極大多數華僑勞動者，乃至小商人，應該徹底覺悟到自己命運的改善祇有一條道路，即絕對不要寄託希望於白種人的統治者，不要坐待『祖國的強大』，不要團結在華僑『大亨』的周圍，也不要奔赴土著人的大領袖，而是要和那力爭獨立與解放的土著人中的勞苦大眾，結成一連道聯合戰線。

凡華僑集居的東南亞各地，因爲土著人民獨立運動的開展，華僑與土著人間的關係問題，將日見其緊張了。如果華僑大眾方面沒有一個正確態度，則坦其隆事件將再三出現，而結果會運果到華僑與土著人的共同命運的。

最後，我們要從印人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這次事件，也可能（自然最少可能）由印人中之少數領袖指使的。爲什麼？且讓我從印尼人的解放運動說起。印尼人的獨立運動，是由印人中的資產階級領導

讀故事的人們失望；但其實這正是『腐蝕』的特色之所在。因爲從這裏，你所得到的不是那特務制度外形上的可怖，而是牠那無所不在的勢力，無所不至的影響，以及他所及於無數人——尤其是年青人——內心的難以解脫的腐蝕作用。這更深刻地控訴了特務制度的特點，更成功地刻劃出這個制度的毒害的實質。

特務制度向一切懷有進步思想的人們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要他們自己來抉擇，這個問題是：身體毀滅抑精神毀滅。易言之，即：死或降。在真正的民主國家中，思想絕對自由，自無所謂思想犯等而下之，在非民主亦非完全法西斯化的國家中，思想已經在『統一』了。於是才發生了『思想犯』，但那時的統一工作還是由普通的法院辦理，最多亦不過由軍事機關處置，對於那些思想上『不穩』或『反動』之輩，根據了什麼『特別條例』，科以數月或數年徒刑就算了。期滿釋出，並無條件。『統一』自統一，『不穩』自不穩可也。由此再進一步，便是特務時代了。這時候，統治者對於『思想犯』放棄了懲罰主義，採取了所謂『再教育主義』。這時候『國家』對於那些『思想錯誤』的人，據說不再以敵人看待，而是以『子弟』相視了。對於這些『子弟』，不再煩勞法院或憲兵司令部，而祇派了許多『專家』，將這些『子弟』們『調查統計』一番，『再教育』一番吧了。但是什麼叫做『調查統計』呢？那是刺探，尾隨，暗捕，密禁；什麼叫做『再教育』呢？那是威嚇，利誘，硬敲，軟騙。這一切身體的摧殘與精神上的腐蝕，茅盾先生的作品裏給了我們一個很出色的描寫。牠用藝術的言語讓我們認識了所謂『調查統計』與『再教育』的全部的內容。

『再教育』的標準極其簡單，那就是我們上面

的。印尼獨立政府的總理沙利爾，據巴黎出版四月十六日的『世界』雜誌說，『認為用暴力逐出荷蘭人，並不是達到獨立的最好方法……』所以他不斷地與英荷的統治者談判，希望與這些帝國主義者妥協，讓他和他的同伴們參加對荷印的統治。可見印尼資產階級的獨立要求是不高的，他們只希望達到菲律賓那種地位就夠了。當英荷帝國主義完全漠視他們的要求之時，他們固然依靠下層的武裝羣衆，同英荷軍隊周旋一下。但後者一讓步，他們便很容易滿足了，便用很大的力量來反對下層真正爲獨立而戰的羣衆。

據四月六日的倫敦『經濟學家』雜誌所載，『二星期前，沙利爾政府逮捕了共產黨領袖湯·馬拉加及其同志數人』。又據上引『世界』雜誌說：『湯·馬拉加在經濟方面，要求一切工業社會化……對於荷蘭人，這位共產黨領袖公開主張武力抵抗……而更可怕的，他能得到印尼軍領袖們的擁護，這支軍隊約有七萬至十萬人……』但奇怪的，荷蘭共產黨報紙『De Waarheid』不僅不要求釋放湯·馬拉加，反而指出湯·馬拉加是托洛次基主義者，是應當被逮捕的。

從這消息看來，印尼獨立運動的內部分裂是很顯然的。資產階級分子已經覺得滿意了，要求停止前進，而下層羣衆則要求徹底打倒荷英帝國主義，實現印尼的真正獨立。托洛次基主義者領導他們。現在這些覺悟的領袖被捕了。羣衆呢？資產階級分子用點手法，將他們的一股怨氣發向同樣可憐的華僑大衆，於是像坦其隆慘案那樣的事情也發生了。

究竟這慘案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現在我們尚難確定，不過這對於我們是不重要的。在我們，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認識：華僑大衆與印尼——乃至全部東南亞——大衆的命運，合則雙利，離則兩傷。無論華僑，也無論印尼人，在狹隘的種族觀念上打圈子，那是要被一切反動者所利用的。

六月十五日

## 天主教與世界政治

蘭因

六月初，法意二國同時舉行選舉，結果都是天主教黨獲得勝利。英美反動報紙對此選舉一致表示滿意。路透社四日倫敦電說道：

『法意兩國選舉之結果，西歐大陸似將成爲保守黨及反共產主義政黨之天下。除西班牙及葡萄牙係由天主教極權政權所統治外，其餘悉爲民主緩進右翼天主教黨之勢力。倫敦某政治觀察家會謂：著名之『西歐集團』似已逐漸成爲事實，惟其中心不在社會主義之英國，而在梵蒂岡而已。意大利之選舉根據最近之市政選舉結果觀之，天主教基督民主黨似可佔得優勢；果爾，則荷蘭，比利時，法國，盧森堡，奧地利，德國南部及意大利，均將成爲天主教政黨之勢力圈。』

路透社這個電報可以代表世界反動勢力對於歐洲趨向的見解。自從法國上次選舉，共產黨一躍而爲第一政黨以來，英美以及其他國家反動派便惴惴不安，害怕法國無產階級起來奪取政權了。現在反動派放下顆沉重的心，因爲共產黨開始失勢，而法國以及西歐其他諸國反動勢力又加緊在各國天主教黨周圍團結起來了。

所說過的：『非死即降』，『非身體毀滅即精神毀滅』，但要實施這個『標準』，却需要一種根據『現代心理科學的』精神與物質的迫害方法，需要一大套複雜多端的『轉變藝術』。換句話說，當他們『統計』到一個人之後，並非立即提出『死與降』的問題，更非立即解決這個問題。他只是將你『硬待』起來，然後在長時間內，用層出不窮的新發明磨折方法，使你走到身體毀滅或精神毀滅的路上去。所以他們的『再教育』不是急性的虎列拉，而是慢性的肺結核；牠殺人，牠毀滅人，但不見血。並且表面上還是『優待』的。這套藝術很高深，很繁雜，是裝裱諸公化了無數的心血與金錢，藉着集體的力量研究出來，並由十數年的血淚經驗累積成功的。結果這『藝術』達到了如此高超的程度，以致一個前進的有朝氣的懷着理想的青年，一經這個『藝術』薰陶，簡直很少不會被『再教育』成頹廢的『犬儒主義的』無所不爲的『標準國民』了。

這樣的『再教育』真是對『人性的最卑劣的姦污』，對『理性的極度侮辱』，對青年理想主義之最無恥的踐踏。對人類進步的大障礙，對人們的基本權利的狂虐的剝奪！

『腐蝕』最詳細地描寫了這個『再教育的藝術』，所以也就是對牠的『姦污』，『侮辱』，『踐踏』，『障礙』與『剝奪』的作用，提出了有力的抗議與控訴！在這一點上，我是特別歡喜了這個作品的。

現在據說是『人民世紀』或『民主世紀』了。在這世紀裏，那個比中世紀的宗教迫害更惡毒更變態的腐蝕勢力，是應該剷除淨盡了的。然而事實並不如此，我們還可以在世界的許多地方聞到牠的臭氣。刺探的眼光，到處可見，猜忌的神情籠罩着人間，人們的心智與思想是到處被強奸着的。在某些

但是反動派未竟過於近視。

議會選舉，無論是怎樣民主的，究竟不能完全正確反映出社會力量底對比。僅僅根據選舉票數，來判斷各黨及其代表的階級力量強弱，以及政治發展趨向，而不分析其他的因素，——那是要常常做出錯誤結論的。

不錯，就選舉結果來看，法意二國天主教黨得到勝利了，西歐各國幾乎沒有例外地成了天主教黨底勢力圈，而資產階級是以天主教黨為中心團結起來的。但這是一個甚麼中心！現在資產階級拿來抵擋革命而用的主要武器，已經不是甚麼『自由』『民主』『民族』『人種』或『法西斯』了，而是『天主教』！資產階級在自己的武庫裏已經找不到一件有效的武器來同革命作戰了，牠必須向中古時代的封建社會借取武器，必須借天主教為主要武器去同革命作戰。

自然，天主教黨並不等於天主教，一國政權落於天主教黨手中亦非表示這國受天主教統治之意。但是現在並非一國或兩國天主教黨取得政權，而是所有西歐國家天主教黨都佔據優勢。一二國天主教黨執政還可以丟開天主教問題而拿其他因素來解釋的，至於整個西歐都出天主教黨執政，則非考慮天主教與現代的政治關係問題不可了。

整個資產階級發展史，也可以說是一部反天主教的歷史。原始基督教本是奴隸反抗主人的一種運動，本身含有革命意義，可是自從君士坦丁大帝定基督教為國教後，所謂『羅馬公教』就與奴隸主人結託而成爲統治機構一部分了。整個中古時代，天主教成爲最黑暗最反動勢力底中心，異端裁判法庭底罪惡史至今猶令人聽聞，多少人爲了思想言論不合於聖經教訓被活活焚死，多少著作和藝術品爲同一理由受了摧殘！在中古封建社會懷抱中開始覺醒的資產階級意識，首先是反對天主教的。

近代，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十六世紀前期的宗教改革。約翰·胡士，馬丁·路得，約翰·加爾文，高舉叛旗反對天主教教義和教皇統治權。代表資產階級的更正教與代表封建的天主教，平分於歐洲。十六世紀後期，荷蘭革命現爲新教荷蘭反對舊教（即天主教）西班牙形式。徹底反對天主教結果，荷蘭遂由他國屬地一躍而爲海上第一個強國。

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就是清教徒（新教底一派）克林威爾反對舊教徒查理第一的鬥爭。天主教國王結果被送上斷頭台去。於是英國代替荷蘭成了海上霸王。

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底羽毛更加豐滿了，牠無須披上宗教外衣，而直接拿出自己的武器，『自由』『平等』『民主』『正義』『理性』等等來打擊封建社會。但牠並不如以前幾次革命更寬容天主教些。『乾脆沒收教會財產，將各地教堂改爲雅可賓俱樂部，拿理性教來代替基督教，不懂天主教被拋棄了，還更正教也被拋棄了。』

這次規範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天主教繼續受人打擊，一八七〇年意大利統一，甚至將聖地羅馬從教皇手中奪取過來，受資產階級政府統治了。這個時期以後，歐洲資產階級雖然從高峯下降，失去其歷史的進步意義，但除了伊伯里亞半島兩弱國（葡西）以外，總未曾墮落到這種地步，向天主教乞憐來反對革命。因爲資產階級有自己的武庫，無須求救於天主教。

地方，『再教育』的手法精練到了神奇之境，以致發生離奇的審判，荒唐的自辱，使人類歷史上最光榮時代的革命家，變成最難令人相信的『法西斯走狗』，叫全世界具有常識與『良知』的人看得目瞪口呆。這些『腐蝕人心』的醜物是必須一起剷除的。如今法西斯雖然倒了，但反特務的鬥爭還必須繼續。不管在什麼地方，祇叫有這制度存在，就必須進行的。茅盾先生的這個作品，無疑能成爲這個鬥爭中的一件有力的武器。

（木君）

## 人類的災難

Larissa Reed

四月十一日，在美國大西洋城，美國化學會所開的春季年會上，有一個報告稱：現在已發明幾種極有效能的新藥，足以根絕人類中之癱瘓了。可怕的癱瘓使世界上半的人口喪失工作能力。其中最厲害的一種，回歸癱，現在貽害了八萬萬人。上述那些發明的藥物，不僅可以治癒回歸癱的病人，並且可以消滅人類這種病症。

關於醫學上這種神奇的進步，我們要特別注意的，牠是怎樣實現出來的。過去四年間，美國化學會和政府醫藥研究委員會訂了合同，從事於這個工作。人們在幕後秘密進行這個工作。全部研究經費都是政府負擔的，其實不過七萬萬美金罷了。

讓我們想一想：爲什麼在好多種可怕的疾病中，政府祇注意這一種疾病呢？既然經過集體組織的和有系統的研究，這個前人認爲不可醫治的病症居然能够防止甚至徹底消滅，那麼爲什麼不用同樣的方法，去替人類解除其他的病症呢？爲什麼政府在平時同在戰時一樣不多支幾萬萬美金，以從事這個社會上必須的任務呢？

回答是這樣的。

可是，現在，這武庫底最後武器，「法西斯」，已經證明沒有效力了，西歐資產階級於是不能不採用牠的祖宗所反對的天主教了。

法意以及西歐諸國資產階級，現在固然團結起來，抵禦羣衆底進攻，但既然是以天主教爲中心來團結的。我們就可明白資產階級底命運是註定要沒落的。這並不是資本主義走向復興，而是牠的臨終掙扎。

天主教黨在西歐各國佔據優勢，除了上述意義之外，還有一種意義，即是表示這個巴爾幹化的歐洲不能再維持下去了。原來，在某種意義之下，天主教是一種「國際」，以羅馬梵蒂岡宮爲其中心，而各國天主教黨乃是這個「國際」底支部。對於世界天主教徒說來，基督經典是絕對真理而教皇權威高於一切。天主教「國際」底存在還在馬克思底第一「國際」以前哩，而且還在千餘年前就存在了。這個巴爾幹化的歐洲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後的事情，即資產階級反對了天主教後的結果。在中古時代，歐洲是整個的，有教皇爲其精神的共主，有神王羅馬皇帝爲其俗世的共主。當時人們自稱爲弗羅梭斯人，米蘭人，巴黎人，漢堡人，迦薩隆人，很少自稱爲意大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思想家，藝術家，常常自稱爲「世界公民」，至少「歐洲公民」，很少以屬於某一定民族自誇或自愧的。民族主義代替這個素樸的國際主義興起來，初期自然有進步的意義，因爲「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本是具有歷史的進步性。可是，現在，這「民族國家」已經成爲生產力底桎梏了。

倘使諸國反動的資產階級投票選舉天主教黨，是乞憐於枯骨的話，那麼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工人投同樣的票又是爲了甚麼呢？第一是爲了各國天主教黨在戰爭期間會反對法西斯侵略；第二是爲了各國天主教黨有個國際中心在梵蒂岡，受這個中心所指揮，互相調整，現出比他孤獨的資產階級的政黨更有力量些，更有辦法些。沒有國際中心的無產階級政黨，與這個有國際中心的資產階級政黨競爭羣衆時，自然是要吃虧一點的。

所以當這天主教黨普遍勝利時候，無產階級要反對牠們，僅僅靠黨內他們的反動本相，還是不夠的，必須自己也要進行國際的團結，形成一個國際的中心，以無產階級國際行動去對抗資產階級國際行動。

這種覺悟，西歐無產階級已經開始有了。就在天主教黨第一次躍爲法國第一大黨的大選舉中，法國有個可注意的新黨出於新的制憲會議。據法國新聞社六月三日巴黎電，此次選舉各政黨所獲票數百分比如下：

- 『一、人民共和運動(天主教進步黨).....二八·二二
- 二、法國共產黨.....二五·九八
- 三、社會黨.....二一·一四
- 四、左派集合(即急進社會黨與抗敵社會民主同盟).....一一·六〇
- 五、自由共和黨.....六·五七
- 六、其他小黨.....五·三九
- 七、國際共產黨(即托派).....〇·二三

按國際共產黨共得四四·九一票。.....(下接第十三頁)

資本主義政府資助和獎勵治癒研究所支出的，原是餉整個三千五百萬萬元戰費的一部份，這戰費是用以征服全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軍隊被派至世界各地。在蚊蟲叢聚，熱病蔓延的太平洋島嶼上，以及其他各殖民地，有成千成萬的兵士死於瘧疾。爲了軍事的效能起見，美國最高軍事當局便命令除去這個障礙——瘧疾。你們知道，兵士們是應該在戰爭中死於鎗炮之下的，而不應該死於瘧疾的！由此可見，這個醫學上的新發明和應用，不過是帝國主義戰爭綱領的一種副產品罷了。

但是同一個資本主義政府，并不願意發起或繼續任何非軍事直接需要的工作。他心甘情願付出幾百萬萬美金去製造炸彈，坦克，大炮，火箭及其他殺人工具，他一年願意耗費五萬萬美金，製造原子彈，他儘有許多錢去製造人爲的破壞武器，卻不肯供給人，物力和金錢以尅制癌，結核症，風濕症，以及其他生物學的仇敵。

瘧疾之克服又可以證明，經過適當的計劃和集體的研究，人類所患的每一種病症現在是都能除去。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統治者不願促進這些有利羣衆的計劃。他們祇關心於那些能增加他們的利潤和特權的事業。

醫學科學和其他科學聯繫起來早已證明差不多一切重大病症都能克服，而人類的壽命是大可延長了。但是在消滅人類身體上疾病的災難之前，必須先從地球上消滅現在人類根本的災難。社會的災難——戰爭，飢餓，瘟疫，早天的原因——就是腐敗的爲利潤而產生的資本主義制度。

(譯自四月二十日「戰士週報」)  
本刊第二期二頁二五行「一九三七」係「一九三六」之誤。  
又同期一百一十一行「英國」係「美國」之誤。



# 革命問題漫談(續)

德

## 四

我們說：中國革命受世界革命所決定。但這話并不是說，中國革命本身沒有特殊性，或中國歷史發展底特殊性對於中國革命毫無作用。恰好相反，我們比別的人更加重視這個特殊性底作用，我們對於中國革命的見解主要是從中國歷史發展底特殊性得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要求我們認識『一般』和『特殊』底意義及其中間的關係。舉例來說，我們要認識一個人，固然必須知道他的生平，他的家世，他的交遊，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環境等等，如有可能還須親自同他交際，但這并不妨害我們預先判斷：他總有一日要死去的，他非吃飯，穿衣，睡眠不能維持生活……等等爲人類一般所共有的通性。我們也重視而且研究中國歷史發展底特殊性，但結論與別的人不同。我們研究結果認爲：就中國歷史特殊的發展來說，現在也是非衝破國界，打破私產制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出路的。

這裏當然沒有位置讓我們詳細分析中國特殊的發展史，但完全不談起也是不行的。我們揀最重要的一點來說一說。

中國歷史發展究竟有甚麼特殊性，與西歐歷史發展不同的呢？——我們僅僅拿中國同西歐相比較，而不拿來同其他國家相比較，因爲向來談中國特殊性的人，不多都是拿來同西歐歷史發展相比較的。此外，我們拿來比較的，又祇是西歐近代史，至多中古史，而不牽涉古代史。總之，就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中國革命來說，我們注意比較的主要是：西歐以前封建社會是怎樣，這社會是怎樣發展爲資本主義的，中國以前封建社會又是怎樣，又怎樣發展成爲現在我們所見社會的。——那麼究竟西歐諸國歷史發展有甚麼共同點，爲中國歷史發展所沒有的呢？

西歐諸國，從意大利到北日耳曼，從波蘭到英吉利，自十世紀起，就先後發生了商業和手工業城市，市民依照職業組成行會，各行會選舉市長，成立『市府』(Commune)，武裝起來，與當時的國王，公，侯，及一般封建地主不斷鬥爭。鬥爭有勝，有敗，但『市府』力量漸漸擴大，漸漸佔據重要位置，直至成爲資產階級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底壘，最後資產階級靠此壘壘推翻了封建地主權力而代爲社會主人。返觀中國，則我們的歷史發展並沒有這個『市

府』因素。這話并不是說：中國古時沒有城市。城市是有的，而且很大，在國家生活中佔據很重要位置。但中國大城市都是政治的和軍事的中心，大多是適應於政治的和軍事的需要而發生而興盛起來的。適應商業的和手工業的需要而發生的城市，中國也有，重要的職業也已經組成了行會，但各行會尚未發展到能够選舉市長，成立『市府』，自備武裝，同中央政府派來的官吏或所謂封建地主進行鬥爭。我們在二十五史和十通裏面仔細尋覓，也許能够發現舊中國曾有工商業城市，其中行會曾經成立『市府』，實行自治，與封建政權鬥爭，而且獲得勝利了的。但即使竟到這種『市府』，在中國廣大的領域和久長的歷史中也不過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決不能算爲歷史發展一個重要因素的。

中國和西歐發展上這個差異點是很重要的。雅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你說牠是封建的也好，是前資本主義的也好，總要記得牠與西歐封建主義社會有一點不同，即缺乏『市府』因素。因此西歐舊社會是地主，農民和市民三個階級底相互鬥爭，而中國舊社會則祇有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相互鬥爭。地主和農民兩階級鬥爭的社會是純粹封建的農業的社會，這社會是沒有出路的，因爲農民雖是封建社會中的被壓迫被剝削被支配階級，佔人口絕大多數的階級，但并不代表進步原則，并不代表一種比封建主義更高的生產力。中國農民在歷史上好多次普遍暴動起來，不靠城市階級領導和贊助，居然能够推翻地主底全國政權，這是歐洲歷史所未曾有過的。結果怎樣呢？農民曾經建立一個比封建主義更進步的社會麼？沒有！農民自己的政權會維持一個長久的時期麼？也沒有！舊地底某部分殘餘或從富農出身的新地主，不久就復奪了政權，而重新建立一個依靠在剝削農民之上的封建社會。如此這般週而復始。如果沒有新因素或階級來參加中國歷史發展，恐怕再過幾千年仍是不能脫離這種走馬燈圖式的循環。大家都能說：封建社會發展爲資本主義社會。但封建社會是不能發展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倘若其中沒有代表更高的生產力的階級，即其中自然發展的商人和手工業主人倘若沒有組織爲和自覺的一個階級，沒有團結商業雇員和手工業工人爲一種社會力量，與地主和農民鼎足而立。西歐社會恰好有這樣一個市民階級，牠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就進行了無量數次的鬥爭，不斷擴大物質的勢力，鍛鍊和發展了精神和思想，到了十六世紀適逢美洲的發現和世界底週航，又開闢了海外市場，更增加了牠的力量，最後才推翻了封建地主權力而建立一個比封建主義更高的社會。牠取得了這個地位，然後才有科學的和藝術的發明，才有蒸汽機，紡織機，總之才有產業革命，使得社會生產突然飛躍起來，以至於今日的狀態。

有人要問：爲甚麼西歐封建社會能有一個市民階級，而中國及其他國家封建社會則沒有這個階級呢？這個問題類似於另一問題，即：爲甚麼英國能夠發明蒸汽機，能開始產業革命，而同時其他國家及異時代與英國一般發展工商業的國家則不能呢？記得拉狄克曾回答後一問題，說是出於種種機緣底巧合，帶有一種偶然的性質。但是西歐市民階級既有七八百年的歷史和鬥爭，那時在社會生活上又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則從利用人力，獸力及其他自然力，走到利用蒸汽力，即使是出於偶然的機會，這機會也容易遇到的。西歐封建社會有如此普遍如此久長如此有力的市民階級存在和鬥爭，確是出於種種機緣底巧合，爲其他國家歷史所難於遇見的。讓歷史家去解釋原因罷，我們這裏是要確定事實，而中國封建社會沒有西歐那種組織爲『市府』的市民階級則是顛撲不破的事實。

在西歐，地主階級和市民階級分別得很清楚。地主財富表現爲土地，而市民財富表現爲資本。依照封建法律，非貴族不能領有土地，而貴族地主則不屑經營工商業的。如此，地主和市民不僅是兩個不同的階級，而且是兩個不同的『等級』(Class)。但在國家法律上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市民階級底鬥爭首先是爲了要求在法律上權利和義務與貴族平等，亦即要求廢除等級制。近代民主鬥爭和議會制度，不是別的，正是市民所用的武器；共和國不是別的，正是『市府』底擴大，正是依照『市府』模型而建立的全國政治形式。中國未曾有過共和國，未曾有過民主鬥爭和議會制度，正是因爲中國各城市商人和手工業主人未曾組織爲有自覺的階級呀！

但他方面，中國正因爲工商業主人未曾構成獨立的階級而依附於地主階級原故，所以沒有明顯的『等級』區分，工商業主人可以領有土地，而地主亦不以經營工商業爲恥，以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漸漸被那爲市場而生產的商品經濟所侵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漸漸佔據了優勢，土地久已可以自由買賣了，農奴制度久已廢除了，成爲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對象的那些封建特權祇有很少數留存下來，而留存的，與其說是出於保守的封建地主力量，甯可說是爲了適應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底需要。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對象顯然是與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對象不同的。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造成了販賣洋貨的商人，即所謂『買辦階級』；在牠領導之下，中國工商業主人也已組織爲有自覺的階級了，各城鎮商會相當於西歐底『市府』，商會會長也相當於『市長』，抗稅，罷市等行動相當於市民階級底日常鬥爭，最後辛亥革命和北伐完成也相當於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了。

根據以上所說，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發展，與西歐不同的，歸納幾個要點如下：

一、中國有組織有自覺的資產階級歷史很短，牠本質上是帝國主義底產物，與帝國主義結了不解緣。

二、反之，中國資本主義很早侵蝕了封建經濟底基礎，無須帝國主義進來，商品經濟已在城市和鄉村佔據優勢，帝國主義更加助長這個優勢，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也結了不解緣。

三、中國過去歷史上祇有農民和地主兩個階級鬥爭，沒有城市階級來領導農民鬥爭，以致社會沒有出路。

四、現在中國不僅有了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而且已經獲得政權，但中國民族尚未會獨立，中國土地問題尚未會解決。

中國革命首先要解決這兩個任務：民族獨立和土地改革。但資產階級不能解決這兩個任務，因爲據以上歸納的諸特殊點看來，牠不能徹底反對帝國主義，也不能徹底反對地主階級。惟有無產階級能負起這個解決責任。可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民族一經獨立，即一經從帝國主義求得解放以後，就要與其他的無產階級國家聯合而衝破原來的中國疆界了；土地一經改革，即一經剝奪地主所有權之後，也就要宣佈爲公有，農民懂得使用土地而不能視土地爲私產了；而這一切又須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能實現的。所以無論就世界革命時代前提說，或就中國歷史發展特性說，中國革命都須實現那衝破國界，打破私產制和無產階級專政三個要求的，即都必帶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未完)

新近回國的旅美華僑聞人司徒美堂，告訴申報記者，說：『美國目前生活費用平均比上海低五六倍，而美國工人所獲工資實尚比目前中國工人所得爲高。』此言足證上海吳市長說『目前本市工資之高業已超過美國工資標準』的話是不可信的了。本刊第二期『中國人工資比美國工人多麼？』一文中還相信『市長決不會拿這話欺騙我們』，可見我們是過於天真了的。好在我們估計上海人工資購買力『約略等於美國人工資六分之一』，則與這位八十歲老華僑底話相符合。

我們上海絲織工人，自從日本強盜打進來以後，長時期都在黑暗與被壓迫之下過着悲慘的生活。

資本家還勾結日本強盜，壓迫我們，減削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增加工作強度。這樣，他們可以大發其國難財。資本家大腹便便，工人就臉黃肌瘦了。

抗戰勝利後，我們以為從此天亮了。可是不然，半年來我們還是在飢餓線上掙扎。工資沒有增加，待遇沒有改善；我們忍無可忍，祇好起來鬥爭。

首先我們募集了各廠工友，建立起自己工會的組織——上海絲織業工會。同時再向廠方提出最低生活改善的要求。可是等了好多天，談了好多次，資本家總不肯給工人一點點利益。我們知道單靠祈求資本家發慈悲是沒有辦法的，只有用自己的力量來鬥爭，才能發生效力。於是在三月十九日我們就實行坐廠怠工了。

怠工了十幾天，資本家還是頑強拒絕。不得已我們一面宣佈罷工，一面請求社會局調解，但當局對工人的事根本不起動，沒有結棍的話，始終像哄小孩子的哄哄我們，叫我們先安心復工工作，慢慢從事調解。我們聽從當局的話，先行復工了。

復工的那一天，資本家見我們馴服可欺，就向工人進攻了。源通綢廠的資本家打頭陣，當即停止工人飯食，謾說工人包圍工廠，叫警察分局來逮捕工人，並驅逐工人出廠。當時我們忍無可忍，就邀集各廠代表開會，並向格爾路警察分局要求釋放被捕九工人。警察分局見工人羣衆要求，答允釋放工人。不料資本家代表來了，不准警局釋放工人。這

## 知識分子與工人

考茨基

現在又急待我們注意的問題，其中一部分是關於知識分子和工人間之敵對關係的。我的大多數同僚將要氣憤起來反對我，說我不應當肯定知識分子和工人間有敵對關係存在。但是這獨敵對關係確是存在的，我們應當承認這是事實，來對付牠，如果用抹煞事實為手段來對付牠，那就是最不妥當的對付手段，同在其他情形底下一樣。

這個敵對關係，乃是一種社會的敵對，即是屬於階級方面的，而非屬於個人方面的。個別的知識分子，同個別的資本家一樣，可以同無產階級聯合，參加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他這樣做時，也就改變他的性質了。這種知識分子還是一般規則底例外，總之本文所說不是以這種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本文所謂『知識分子』，若無特別說明，都是指普通的知識分子而言的，他們具有全體知識分子之特性，他們採取資產階級社會立場，他們與無產階級之間有某種敵對關係。

可是這種敵對是與勞動和資本間的敵對有區別的。知識分子並不是資本家。不錯，知識分子底生活標準是資產階級的，他必須保持這個標準，否則要成爲窮人了；但同時他也必須出賣他的勞動底生產品，有時還要出賣他的勞動力；他自己也是常常受資本家剝削和屈辱的。所以知識分子和工人間並沒有甚麼經濟上的敵對。但他的生活狀況和他的勞動條件則不是無產者的，這就產生了某種感情上的和思想上的敵對。

作爲孤獨的個人來看，一個無產者是毫無力量的。無產者底力量，他的進步性，他的希望，是完全從組織產生出來的，從他與夥伴間共同有系統的行動產生出來的。當他是一個大而強的團體之一分子時，他就覺得自己是大的，是強的。對於他說來，團體是最重要的，個人則很渺小。無產者，以無名羣衆之一分子資格，非常忠誠從事鬥爭，并不企求私人利益或私人榮耀，無論派他甚麼職務，他都按照自願的紀律去執行，他的一切感情和思想都浸透了這種紀律。

知識分子便完全不同了。知識分子不是依靠權力來鬥爭的，而是依靠論據來鬥爭的。他的武器就是他個人的知識，他個人的能力和他個人的信念。他祇有靠他個人的能力才能取得某種地位。所以在他看來，自由發揮他的能力乃是他成功的條件。要他做全體底一分子，爲全體服務，是很困難的；他若是這樣做，那是爲了不得不，而非爲了喜歡。他認爲祇有羣衆才需要紀律，至於少數優秀人物則不需要紀律的。他自然認爲屬於優秀人物中的。

知識分子和無產者間除了這種感情上的敵對之外，還有其他的敵對。智識分子受過我們這時代的普通教育，自以爲高乎無產者之上。恩格斯曾經說過，他少年時候也曾自命爲有了不起的學問去接近工人哩。知識分子很容易忽視無產者之爲戰友的地位，很容易忽視無產者是與他平等的，他是必須在無產者身邊共同戰鬥的。他反而常常祇看見無產者知識淺薄，他的責任就是提高無產者底知識。他把無產者不是看做同志，而是看做學生。知識分子很服膺拉沙爾說的：『科學和無產階級結合以提高社會的名言。知識分子以科學代表人自居，走到工人羣衆中來，不是把工人看做同志，與之合作，而是自命爲工人以外的友好的

時工人憤然萬分，包圍那三個資本家代表，要求他們担保立即釋放被捕九工人，警局見資本家被工人包圍，就用大隊武裝警察亂刺工人，又用自來水亂澆工人，我們仍然不肯散去。同時大隊陸軍亦出動壓迫工人，架起機關槍，如臨大敵。當時工人被刺傷很多，血流滿地，其狀之慘，令人傷心！

我們各廠代表向社會局請願，但沒有一點結果。後來，四月二十日，我們決定舉行一次示威。那天參加的男女工人有二萬多人，天下着雨，淋得我們衣服透濕，可是我們爲着生活改善的要求，不管天雨，都從滬東，滬西，滬南，滬北等地方集中攏來，我們手裏拿着要求的旗子，口裏喊着要求的口號，排着隊伍向前進行。我們這次遊行示威，目的在取得社會的同情；訴說自己的痛苦；爭取罷工的權利；以及表示我們工人階級的力量。

果真，這次遊行示威不是白費力氣的。資本家及其幫手們自然有點嚇起來了。於是請出朱學範先生來調解，朱先生的調解當然亦不出朱先生的老辦法，就是叫我們工人先行復工然後談判，先給資本家一個面子。我們只得聽從朱先生的話，先行復工了。但這次資本家見過我們工人團結的力量，不敢像上次一樣反攻了。於是就由朱學範先生邀集勞資二方在東西洋飯店談判。結果，答應我們的要求，其大意如下：

(一)工資照戰前一元六角底薪依生活指數計算(如天香絹以八碼二五，一元六角底薪計算；素絹以三十碼一元六角底薪計算；明華葛以四十六碼一元六角底薪計算；光明緞以二十八碼三，一元六角底薪計算；……等)。

(二)等經等緯工資照給，每天以五角底薪計算。

(三)二月份工資照法幣一千七百五十元普加

力量來幫助工人的。

拉沙爾說那句名言時，他是認爲：科學同國家一般都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上的。今天我們知道這個見解是錯誤的。因爲國家乃是統治階級底工具。至於科學，則僅僅在與階級無關的限度內才是超出於階級之上的。這就是說祇有自然科學是超出於階級之上的，社會科學則不是超出於階級之上的。當我們從某一階級立場，尤其從那與現社會敵對的階級底立場，來看這個社會時，則科學研究之結果就要產生完全不同的結論。科學，若是從資本家階級那裏帶來給工人的，則必然適應於資本家利益。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卻是如何科學地去瞭解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這種科學，工人依照政府和社會認可的手段，是無法獲得的。無產者必須爲自己發展自己的理論。爲此原故，他必須是完全自學的，不論他出身是學者或無產者。研究底對象是無產階級的自身的活動，牠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牠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無產階級底理論，牠的自覺，祇能從這個活動產生出來。

科學和勞動結合以造福人類的話，可見不可瞭解爲那種意義，即說：學者們將他們從資產階級學校得來的知識傳授給工人，——而應當瞭解爲這種意義，即說：凡屬我們的戰友，無分學者或無產者，凡能參加無產階級活動的，都應利用共同的鬥爭，或至少應檢討這個鬥爭，爲了求取新的科學知識，以便轉過來幫助未來的無產階級活動。既然是這樣，那麼我們就不能設想一種從外面傳給無產階級的科學了，也不能設想無產階級和科學作爲二個獨立力量的結合了。凡能促進無產階級解放的科學，祇能由無產階級和黨無產階級來發展。自由派從資產階級科學界帶來的東西，是不能促進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有時反妨礙了這個鬥爭。

下面幾段可說是離開了我們主題的一些枝節，但今天知識分子問題變成如此重要，這些枝節也許不是全無價值的。

尼采底哲學讚美超人，在超人看來，自己個性底發揮重於一切，至於個人從屬於社會大目的，則是庸俗而可鄙的。這種哲學真正是知識分子哲學。牠使得知識分子完全不能參加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

尼采之下，建立於知識分子感情上的一種哲學底最顯著的代言人，是易卜生。他的史托克曼博士(即「人民公敵」)并非社會主義者，如好多人所誤解的，而是那種知識分子，他們必然要與無產階級運動及一般民衆運動，發生衝突，當他們企圖在這運動裏工作時候。因爲無產階級運動及一切民主運動，其基礎乃是尊重同志底多數意見。史托克曼式的知識分子則把「共同意志的多數人」看做一種怪物，非打倒不可的。

無產者和知識分子中間既有上述的感情差異，那麼知識分子和他所加入的黨中間也容易發生一種衝突了。即使他入黨後并不引起他的經濟困難，即使他對於運動的理論見解是沒有錯誤的，這個衝突也會發生。不但那些最壞的分子，甚至性格最好而又忠誠於其信念的人，在這點上也常常會於黨內觸礁沉船的。

所以每個知識分子未曾入黨以前自己須先細心檢討一下。黨也須先考察他，看他能否完全投身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裏面，爲其中一個簡單的兵士，不至感覺受束縛或壓迫。凡能這樣做的人，一定可以依照他的能力，替無產階級做極有價值的服務，并從他的黨內工作得到很大的滿足，凡不能這樣做的人，則一定要遇着磨擦，失望，衝突，對於他自己，對於黨，都沒有好處。

五成照碼計算之。

(四) 津貼夜工點心錢每天五角底薪計算。

(五) 碼尺英尺四寸計算不折不扣，公尺九五扣。

(六) 女工生產期內工資照給，以五角底薪計算。

(七) 一號十六號及紀念日放假，工資照給。

(八) 廠方要開日夜班須經老工人同意。

(九) 難做生活大眾做不到一元六角，照一元六角底薪計算發給工人。

(十) 飯錢以二角底數計算，先由廠方墊付，後在工人工資內照扣，不足由廠方補貼之。

(十一) 無故不得開除工人，開除工人須經工會同意。

我們這次罷工共計五十三天，在這五十三天內我們受盡侮辱，壓迫，飢餓，痛苦。但終於得到勝利了。我們得到的利益，是靠我們自己團結和鬥爭的力量，可是我們得到的改善，還沒有恢復到戰前的生活。

我們從這次罷工鬥爭所得的教訓，深深知道資本家是不肯和工人合作的，或自動給工人改善生活的。只有我們自己團結緊，鬥爭得澈底，才能得到生活的改善。

記者按，工友李阿德將他參加罷工的經過寫給我們，其中所說是極可珍貴的。他還附了一封短信，說他在街上買了本刊第一期，知道本刊是站在工人立場上說話，所以才寫這篇通信給我們。我們希望每期至少有一篇關於勞苦大眾生活和鬥爭的通信，但這是有待於讀者合作的。

知識分子，完全同化無產者感情，文章寫得好，但完全失去知識分子特殊心理，與高采烈與下層羣衆相處，無論派他甚麼工作都願意去做，又全心忠誠於我們的偉大事業，鄙視那種以為個性受束縛的感歎，如尼采和易卜生哲學所訓練出來的人每遇處於少數地位時所做的，——這種知識分子正是社會主義運動所需要的，他們的典型就是李卜克內西。我們也可以舉出馬克思，他從來不受出風頭，他在國際中常處於少數地位，而他的真誠的紀律是堪為模範的。

以上是考茨基論梅林的長文中一部分，原文載於一九〇三年出版的『新時代』報 (Neue Zeit)，第二十二卷，第四號，第一〇一一—一〇三頁。關於知識分子和工人的關係問題，可見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已有很長久歷史了。這個問題，對於現時中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選譯這段文字，供給大家參考。這裏必須說明的，是考茨基寫此文時在距今四十多年以前，距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也在十多年以前，換一句話說，即考茨基是在他背叛馬克思主義以前十多年寫這篇文章的，那時考茨基不僅被一般人公認為馬克思主義代表人，連列甯也是常常引用他的話，好像引用權威者底話一般的。文中所稱『科學』，德文原文為 Wissenschaft，與英文 Science 意義微有不同，即泛指一切學問之意，而非嚴格的科學之意。

譯者  
(上接第八頁) 法國新聞社上面的表中，『國際共產黨』佔據的百分比是很小的，即投票一萬人中祇有二十三人投牠的票；依照此比例，則六七百個制憲會議議員中牠祇能佔據一人或二人。但法國新聞社，很奇怪地，不把牠混在『其他小黨』一項內，而把牠另列一項，並且特別加了按語，註明牠所得選舉票底絕對數。於此可見一般輿論對於這個新出現的黨是如何重視的了。

趁此機會，我們不妨向讀者介紹一下這初出現於法國議會而受公眾所重視的『國際共產黨』。

這個黨正確譯名應當是『國際主義的共產黨』，以別於放棄國際主義的法國共產黨。牠是第四國際底法國支部。牠雖然在此次選舉以前不久才取得公開的合法的地位，但牠並不是新成立的黨，牠已有十多年歷史了。法國淪陷後牠積極參加抵抗納粹的運動，牠的機關報『真理』是第一張秘密出版的報紙，牠的領袖和黨員被蓋世太保槍斃了好多人。可是，法國解放以後，戴高樂政府不許牠的機關報出版，『真理』直至此次選舉前一個半月還是秘密出版的報紙。經法國工人和社會黨若干支部底抗議，以及美英荷諸國工人團體和自由派團體底聲援，法國政府最後才允准『真理』出版了。第一期合法的機關報出版於本年四月十六日。這期報紙宣布參加選舉，而且在巴黎兩區和國內六省中都有候選人提出。六星期以前還是不合法的黨，六星期以後就有代表在國會裏面了。四五萬選舉票雖是有限的，但極富於象徵意義，證明這個黨如何發展迅速。黨底發展又說明了法國工人要求有個國際中心來指導他們，要求其他各國工人來援助他們，以抵抗那由梵蒂岡指揮，而受英美贊助的天主教黨。

中國現在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紅衣主教，中國天主教會地位和制度被教皇提高至於與西方諸基督教國相等了。這是表明梵蒂岡中心並沒有忘記將中國納入於牠的『國際』範圍之內。中國工人需要社會主義的國際，但不需要這成立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國際。反宗教的，尤其反天主教的運動，現在應當同反本國封建的意德沃洛基運動一般為國人所重視呀！

#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Isaac 著  
唐 威 譯

新 旗 第三期 14

此時，中國資產階級尚未成熟，牠的經濟基礎還很淺薄，牠的利益還不一致，以致牠不能更有力地影響事變進程。所以有志於改革的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祇能寄託其希望於一種開明的君主制。不幸，皇帝旨表現出沒有力量，不能做社會改革工具。皇帝不過是他的國家機構之化身罷了。到了皇帝要破壞這國家機構本身時，他就遇着頑強的抵抗，那些改革家在這惰性抵抗前面是一籌莫展的。(註二二)

保守的滿清官僚能够阻塞若干個人所進行的改革細流，却無力抵抗那些決定牠的滅亡的各種重大因素。帝國主義者一次又一次打擊得牠不能立足了。上世紀末了幾年，列強紛紛來佔取土地，商業和鐵路底權利。(註二三)在國內，舊時手工業經濟底破壞，生活底昂貴，水旱底頻繁，又激起了一次原始性的羣衆暴動，此次則是發生在北方諸省，那裏舊的祕密團體復活起來，繁盛起來，把受苦的民衆底憤怒轉移去反對一切外國人，無論是滿州人或西方人。太后領導下的官僚撲滅了維新運動之後，就去採取一種危險的手段，即轉移這個羣衆暴動去反對洋人。官廳公然贊助『義和拳』。暴動的民衆也改變他們的『興漢滅滿』口號，爲『扶清滅洋』口號。(註二四)

結果當然是失敗的。原始性的地方的暴動被外國人新式武器所撲滅了，勝利者以一九〇一年的『拳匪條約』施行種種殘酷的刑罰於中國，其中含有三萬五千萬金元的賠款和好多軍事便利。以後幾年，中國束手無策，祇好坐觀列強以牠爲犧牲而互相衝突了。中國鐵路，租界以及全省土地，其命運是在歐洲諸國政府決定的。滿洲和朝鮮底監督權是由日俄在中國領土上的戰爭來決定的，戰後條約自由處理中國所有權，而無需徵詢中國政府意見。滿清朝廷再不能代表中國人民說話了，再不能阻止車的主權底漸次喪失。

中國智識分子從此拋棄了改良希望而去宣傳革命。人們深深認識滿族皇朝已不能救藥了。學生和智識分子離開了康有爲，開始傾聽另一個亡命者孫文底聲音。

孫文當初也曾上書朝廷請求變法，但他的政治發展是受其他潮流的影響，與當時著名的改良派所受影響不同。他生於廣州附近一個鄉村，其時在太平天國滅亡後二年。他幼時就認識了一些做地下工作的激烈分子，他們保有太平天

國的武裝暴動傳統。他少年時到檀香山去，做了基督教徒，吸收聖經時也吸收了美國民主思想。他的政治事業開始就採取了祕密組織推翻滿清的道路。一八九五年他第一次起義失敗後，就亡命外國，在華僑中活動，求人贊助他的革命綱領，而且得到贊助了。

孫文與華僑的關係，對於中國第一次革命進行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中國資本主義，爲了外國戰爭原故，又爲了城市資本和鄉村半封建的土地剝削之間有有機的聯繫原故，不能發展。這些因素既然阻止了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自然也阻止了強大的明白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運動出現。但海外華僑，在印度，南洋的，歐洲的和美洲的，勞動者或商人，則是直接與近代民主政治相接觸的。外國人在中國受官廳加意保護，中國人在外國則受輕視和迫害，這兩種情形形成了明白的對照。於是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先在海外華僑當中發生出來了。種族的家庭的和傳統的聯繫非常有力，使這些僑民依戀於祖國，首先用金錢和道義贊助革命運動。可注意的，即富有的華僑中祇有少數人贊助這建立富強的獨立的中華民國的鬥爭。孫文募集的錢，大多數是華僑中工人和小商人零星小款湊成的，他們比別的華僑更早有決心去贊助孫文的政綱。

這個政綱底中心點，就是用軍事陰謀爲手段去推翻專制制度。現在那些失望的維新派以及新一代的學生，尤其一八九五年及一九〇〇年以後紛紛到日本去的學生，大多數接受這個政綱了。在中國國內，革命運動是與祕密會黨有聯繫的。新來的城鄉智識分子，給與原來的祕密會黨以民族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色彩，出國留學帶了新思想回來的學生，到處遇到同情者。民主的民族的思想深入民間。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鼓舞了中國智識分子，而且大大推動朝廷趨向

(註二二)關於此時期的有用文件見 M. E. Cameron 著的『一八九八—一九二二年間中國改革運動』(史丹福大學，一九三一年出版)。

(註二三)見 Laurent 著的『中國人，其歷史及其文化』，第一卷，四〇四頁及以後。

(註二四)見 R. Wilhelm 著的『中國靈魂』(紐約，一九二八年出版)，二六頁。

於讓步。(註二五)中國商人和資本家愈來愈大膽了。最明白表現出來的，是一九〇五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和一九〇八年的抵制日貨運動。

這兩次運動都帶有廣大的羣衆的性質。中國使用經濟武器來反對美國人對待美國華僑的橫蠻態度，這已可表明中國商人和小資本家之間已有一種新的自覺心和團結精神了。抵制美貨運動把美國華僑和國內人民更加密切聯繫起來，大有助於破除地域成見。運動最熱鬧地方是廣東，因為美國華僑大多數是廣東人，但新嘉坡，上海和天津也有示威和抵制。最有意義的，還是參加運動的民衆公然表示不信任政府，因為政府受了美國外交壓力會下令取締抵制運動。

一九〇八年的抵制日貨運動更加含有反對政府的性質。這運動是政府懦弱屈服於日本爲某海船事件的要求，所引起的。商人從嚴日本貨，碼頭工人則拒絕替日本船卸貨，——這大約是本世紀中國工人直接參加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第一次罷工。(註二六)

抵制美貨運動提出的要求，其中有一條是要求取消美國公司建築粵漢鐵路之權。各省富商和地主正是爲了這個鐵路問題發展其反對政府的鬥爭的。聯絡廣州漢口長沙成都的鐵路計劃已經擬好了，實行此計劃的鐵路公司，中國資本的，也已經成立了。北京政府現在成了買辦工具，認爲將築路權讓給外國公司對於買辦是很有利的，於是用外國的錢去購買那業已投入鐵路事業的中國股票，爲的使中國公司變成外國公司。於是原來的鐵路股東紛紛起來反對了，尤其是兩湖及四川的股東。祕密的革命團體此時就利用這個問題做個廣大的鼓動，使人明白滿族政府和可恨的外國剝削者是一致的。(註二七)如此吸引了上層階級的一部分分子來參加那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正是這個問題在四川爆發了公開衝突，最後才引起武昌革命。

滿族皇朝最後十年，時時刻刻都有總崩潰危險的，祇因屈服於改革壓力，才得暫時免於崩潰。皇太后和她的諸顧問終於明白，拳亂之後種種的不安甯，除了遷就和妥協之外，沒有辦法。那時局勢顯然是非讓步即滅亡。一九〇六年，做了中國統治者將近三百年的朝廷，不得不勉強承認立憲政體「原則」了。一經承認此原則，皇帝種種天賦的權利就漸漸沖淡了。到了他的最後的有力的代表人從舞臺面消失了之外，皇朝底命運就不可挽救了。皇太后死於一九〇八年末，被囚禁的皇帝也跟她進墳墓去。她的那些老顧問不久也追隨她於地下。坐在龍座上的是三歲皇帝溥儀，一個愚蠢無能的人做攝政，代替他統治國家。朝廷變爲親貴私黨爭權奪利的場地。紙上的改革被允許了，更多些，但也更吝嗇些，更不可實現些。一九一〇年，各省諮議會議會開會，這是嚴格限制的「人

民選舉」(註二八)之結果，極像俄國帝制時代的「紳資會」(Zemstvo)。諮議會議僅有討論權，而且祇能討論皇帝交議的事件。但即使是這種由上頭細心挑選的議會，仍與朝廷發生衝突。牠們宣稱，惟有一個更廣大的更負責的政府才能保持君主制度。各省諮議會議派代表到北京來開會，併命促成議會制度底實現，不願朝廷如何抵抗。形式上的改革採取了，但舊制度仍束縛了新成立的團體，使之不能發生作用。這個由各省總督親信所組成的全國諮議會議圖謀拖着君主政體經過「議會」道路走向幻想的富強去。正當諮議員們滔滔答辯時，革命已經超過他們前頭去了。

一九一一年九月間，四川發生一個地方性暴動，反對政府官吏；十月間，武昌衛戍軍接着暴動起來。當駐防漢州的政府軍隊拒絕開動去討伐叛軍時，滿族皇朝底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革命繼續展開，朝廷於是答應接受一切要求，祇求能够保存名義上的統治。但那已太遲了。帝國崩塌了，瓦解了。牠爲挽救那不可轉移的命運而搖舞着的「立憲」旗幟也跟着拋棄了。

內部的腐蝕已經使得皇朝衰朽到了這種地步，祇消輕輕一推就可把他推倒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祇產生了足夠的力量去做這輕輕的一推。革命之後，沒有一個階級出來，能够解決土地問題和爭取民族獨立，以保衛中國免受帝國主義列強繼續的侵略和壓迫。中國資產階級與土地的半封建剝削利害一致，這就註定了這個階級無能領導陷於貧困的農民渡過難關。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者連解決農民貧困的企圖都沒有。農民羣衆沒有參加這推翻皇朝的行動。農民如此袖手旁觀，各省舊的軍政機關才得保全舊時制度，除了取消帝制名義和剪去辮子，——這是滿族征服者，最初強迫民衆仿效的裝束以表示降服的。

(註二五)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日，倫敦「泰晤士報」北京專電曾提起了

「俄維斯事變，以及中國駐彼得堡公使打來的含有警告意義的電報。」

(註二六)關於這二次抵貨運動的記載，見C. F. Richter 著的「中國抵貨

運動研究」(巴地摩爾，一九三三年出版)，第四，第五兩章。

(註二七)關於這些團體工作狀況，見Trotter 著的「中國約書」(紐約，一九三四年出版)前幾章。

(註二八)例如，山東全省人口在三千八百萬人以上，但財產和教育程度

合於選舉資格的，祇有十一萬九千五百四十九人。湖北，則三千四百

萬人口中祇有十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三人有選舉權。——見一九一〇年

二月十八日 North China Herald 報。

帝國政府消滅了，政權實際落入於各省或區域軍閥之手，他們要保全現有的全部剝削制度。外國人對於中國經濟政治生活的操縱權，經過軍閥手裏，更加鞏固了。各區域政權的劃分，大體適合於列強底「勢力範圍」。雲南和廣西軍閥得到法國支持。經濟上受香港和上海支配的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更加確定地處於英國勢力之下。北方大部分成了日本底特殊範圍。這些軍閥中間不久之後將要爆發的內戰，首先是反映帝國主義列強間爭奪經濟要塞之衝突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後時期，與過去諸朝代崩潰後分裂，戰爭和混亂時期所以不同的，就在於過去沒有帝國主義背景，而現在有這個背景。

參加了革命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這個新形成的分裂和內戰前面，束手無策。他們當初反對滿族皇朝時，所用的手段并不能造成一個真正的民衆運動，因為他們當初的階級經濟上尚未成熟，政治上尚無力量。這個階級要保全牠在土地上的利益，就必須保全中國農村一切落後的事物，如封建的家族制，文盲，迷信，總之舊制度所依賴的一切東西。他在城市的利益是競爭不過外國資本的，因之屈服於外國資本的。爲此原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鬥爭就採取了軍事陰謀手段，但每次失敗。推翻帝制的行動，幾乎與知識分子努力無關的。以後，他們就更依賴於獲得實權的軍閥了。他們所造成的議會，所起草的憲法，并非真實的政治力量，僅僅被那些保護他們的軍閥勉強容忍或有意利用來做裝飾品罷了。勝利後回國被選第一任總統的孫文，不久就須讓位於袁世凱，他是舊制度下一個將軍，革命中在北京取得實權。

知識分子中，那些沒有替無知識的軍閥做祕書或僚屬的，便退出運動，陷於消極和麻木。孫文和他的國民黨中殘餘分子，迷戀於議會制度，把「護法」口號寫於黨旗之上。他們僅僅在聯合這派軍閥反對那派軍閥當中尋找出路。他們每次都是失敗的，僅僅軍閥得到了勝利。

推翻帝制這件事本身具有歷史上一種重要的進步意義，但現在好像使國家墮落到更深的地獄去了。國內戰爭和軍閥統治加深了農村底貧困。榨取增加。土地荒蕪。農業生產低降。中國不得不開始從外國輸入米麥，饑荒和天災斷送了無數人命。幾百萬農民，沒有土地，便來充實軍閥的軍隊或者去當土匪。苛捐雜稅和軍事攤派，加速了農村經濟底毀滅過程，使得廣大多數人民陷於極性的饑餓狀態。城市工業不能吸收廣大的剩餘勞動，而且似乎永無這種吸收能力。但是，正在這一點上，忽然開始發生迅速的變化，爲世界大戰的一種直接後果。

大戰吸引了交戰各國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工業生產。中國資本家出乎意外地

發現廣大的市場呈獻在他們的面前，而外國資本底壓力也暫時鬆懈了。由於大戰底要求，中國輸出愈劇增加，入超迅速減少，一九一九年祇有一千六百萬兩入超。若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則輸入方面，一九一四年爲九一·六，一九一九年爲一〇五·九；輸出方面，一九一四年爲八三·八，一九一九年爲一四〇·一。從這些數字看來，在大戰幾年中，輸入入差不多是沒有變動的，輸出則向前大跳一步。(註二九)

更明顯得多了，是大戰期間中國工業底發展。機器輸入，從一九一五年的四·三八〇·七四九兩增加至一九二一年的五六·五七八·五三五兩。紗廠從一九一六年的三十二所增加至一九二三年的二百二十所；綢緞則從一·一四五〇〇〇增加至三·五五〇〇〇〇。絲廠從一九一五年的五十六所增加至一九二七年的九十三所。香煙廠從一九一五年的四所增加至一九二七年的二百八十二所。(註三〇)若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三年有如下的數字：煤炭生產一八三·五，生鐵生產一八〇·六，生絲輸出一五二·三，大豆輸出四三二·五，紗錠四〇三·九。同時，交通和航業也有可觀的增加，雖然比上舉數字小些。(註三一)

與上述種種發展同時，還有中國工商業機構底重大變更；股份公司形式被採用了；銀行事業被普遍應用了。機器迅速代替了手工生產，跟着舊時師父彫計——徒弟關係，在重要的經濟部門，也就讓位於股東——經理——工人關係了。

生產力如此發展，一面使得中國資本自然起來與那根根深蒂固的外國利益和特權發生衝突；一面又使得新的工人階級與他們的雇主發生衝突，無論是外國雇主或本國雇主。從這些新的源泉發生了新的運動，以後十年間瀰漫於全中國。(第一章完)

(註二九) 見 Fong 著的『中國工業化』，表一(甲)和(乙)。

(註三〇) 見 C. H. Lowe 著的『中國勞動問題』(上海，一九三三年出版)，表，六，七，八，十。

(註三一) 見 Fong 著的『中國工業化』，表一(甲)和(乙)。

法國新聞社六月二十三日華盛頓電：『勞工部頃發表報告稱，美國生活費自一九三九年迄今，計已增加三分之一。』這話就是說，戰前實一元美金的物品，現在須實一元三角三分美金。但在上海，則戰前實一元法幣的物品，現在須實四千元了(據市政府公布的工人生活費指數)。